

爱国民主先贤樊弘

张涛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社科界工作者代表。前排左起：张志让、胡绳、翦伯赞、谢觉哉、李木庵、范文澜、王学文；第二排左起：艾思奇、吴贻芳、侯外庐、樊弘；第三排左起：陈伯达、吴觉农、钱

文人轶事

章太炎不用一种尺子量人

张雨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及国学大师。他在对待人方面遵循区别对待原则，从不以一种尺子量人。

一次，章太炎和学生闲谈，提到一个学生的名字时，大家言辞有些不屑一顾，章太炎敏锐地从学生们的表情中读到了什么。细问后得知，这个学生颇为吝啬，也很少和别的同学来往。在一次慈善活动中，其他同学都慷慨解囊，只有他未出分文。章太炎听后，摆摆手说道：“此一项不足以论吝啬。”

接着又谈起另外一名学生时，大家摇头，声称此人生活过于铺张，未免奢侈。章太炎问道：“你们说说，这个学生如何铺张？”大家回答：“每日衣着与

餐食好过别人数倍。”章太炎听后仍是摆摆手说道：“此一项不足以论奢侈。”

见大家疑惑不解，章太炎解释说：“没有捐款的学生可能只是因为困窘，经济上的拮据，让自己过得捉襟见肘，如何给人施以援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每日着华服、食美味之人，大概家境富有，众人眼里的奢侈在他看来只是寻常生活而已。因此，这些不应该成为评判他人的依据。”

后来大家得知，事实上果然如章太炎所说，遂反思自身的成见之深，对章太炎肃然起敬，钦佩不已。

章太炎能够区别对待，不用一种尺子去量别人，不被偏见所蒙蔽。这不仅是他的高明，更是一种睿智。

文人轶事

季羨林与清华“旁听课”

王剑

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羨林，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得益于在清华求学时的几门“旁听课”。

1930年，季羨林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对选修课要求较为宽松，于是季羨林经常去旁听外系的课。他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人的课。冰心当时非常年轻，满脸庄严，不苟言笑。她看到教室里人满为患，知道其中有“诈”，就严厉地说：“不是本专业的学生，下课就别来了！”季羨林自觉无趣，从此不敢再进冰心的课堂。

旁听郑振铎的课，却有意外之喜。郑先生豁达大度，待人真诚，没有名教授架子。季羨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人因为听课，与郑振铎成了忘年交。后来，作为特约撰稿人，他们的名字赫然印在《文学季刊》的封面上，几个人都倍受荣幸。

让季羨林受益终身的，是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陈寅恪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一个布包，里

面装满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这给季羨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陈寅恪是考证大师，讲课时，“他总是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仿佛引导学生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陈寅恪的这种学风，影响了季羨林的一生。

季羨林后来回忆说：“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身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直至今日，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朱先生美学的熏陶；而搞佛教学、佛教梵语和中亚古史语言，则与陈寅恪先生分不开。如果没有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和提携，我不会走上现在的治学道路，也进不了北大。”

文人轶事

吴贻芳的愤怒

顾燕

1922年5月，吴贻芳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的来信，信告诉她，经过该校校长的大力推荐，决定接受她去该校学习。当年8月，吴贻芳就来到密执安大学，进入该校研究生院生物系学习。

吴贻芳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自立意识较强，她很快就熟悉并适应了密执安大学的一切。她的英文基础非常好，学的又是自己喜欢专业，所以成绩自然是出类拔萃的。但她并不满足这些，她深知这样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十分珍惜。为了采集标本，她将积攒下的钱买了一辆破旧的福特牌汽车，经常驾驶这辆老旧的汽车外出收集标本，进行考察，成了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

吴贻芳的勤奋和热情很快赢得了中国留学生们的喜爱。1924年，她被推荐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1925年又当选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吴贻芳的社会活动能力不一般。

1925年，国内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美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些消息。吴贻芳在紧张的学习中仍然注视着

事态的发展，她多么希望祖国能够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欺侮。1926年的某一天，一个外国的总理应邀来校演讲，听讲的师生有4000多人。在演讲中，这位总理十分傲慢地声称：“中国不能算为一个近代国家，邻近的亚洲国家应就近移民到中国去。”这是典型的赤裸裸的侵略理论，这里所谓的“移民”，就是殖民的另一种说法。

同时，这位总理在言辞中对中国人还颇多讥讽，在场的中国留学生闻之哗然，群情激奋。吴贻芳更是气愤，认为这是对国人的极大污蔑。

这天晚上，吴贻芳连晚饭也没有吃，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批驳文章，刊登在学生自己编辑出版的《密执安大学日报》上。中国同学读了觉得十分解气，认为写得好，美国同学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见了她也表示赞许。但是吴贻芳深知，只有祖国真正强大起来，国际上这种轻视中国人的现象才会彻底消除，从此下定了教育救国的决心。回国后，她于1928年受聘于母校金陵女子大学，先后主持校务23年。

文人轶事

高晓声写“陈奂生”

周星

1983年，《陈奂生上城》拍成电影后，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影片中的主人公“陈奂生”是否确有其人，也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其实，“陈奂生”是有原型的。他就是高晓声家族的堂兄弟高焕生。高晓声对高焕生知根知底，彼此很熟悉、很了解。因为两个人既是邻居，又是本家亲戚。从1957年之后的20多年间，高晓声一直生活在农民中间，与乡亲们休戚与共，风雨同舟，自己也成了地道的农民。

同电影里的陈奂生相比，高焕生身材魁梧，显得很有力气。只是有点憔悴，太阳穴凹陷，颧骨凸起，下巴弯弯的，向上翘着。他也不穿电影里的中山装，平时上身穿蓝布短衫，布搭襟纽扣；下面是黑色大裤管短衫裤，穿时拉一拉白色裤腰，往左一摺，然后用帆布带束住。

看到《陈奂生上城》被拍成电影后，高焕生郁闷极了，不止一次说道：“高晓声是写现实。他写卖油绳，

我真的卖过，卖得好一天能赚十来元。那个‘投煞青鱼’的绰号也是我的。但因为这部电影而影响了我的生活，我真是心有不甘。”电影《陈奂生上城》拍完后在董墅村公映，大家都总愿高焕生到场现身。结果他一个劲儿拒绝，说道：“我不去，坚决不去。要是我去了，大家都不看电影，全来看我了！”

后来镇上也要放电影了。吃晚饭时，不少人围着他的女婿起哄：“快去看你老丈人啊！大家都去看啊！”他的女婿气得跳脚，心想：“我让你们看不成！”于是，就操起一把剪刀，蹿到露天电影院，“叭”地把电线剪断了。这下大家都没法看电影了。镇公社向高焕生索贿，他头也不仰，推卸责任说：“不关我的事，全是高晓声写文章写出来的事！你们要赔偿，就找他去！”

然而，在相邻的焦溪洼翟家湾放映后，当地老百姓齐声称赞高晓声把农民写得活灵活现。直到现在，当地群众还对此津津乐道。

参加新政协 建设新中国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

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北局，提出拟在平、津邀请许德珩、樊弘、袁翰青、劳君展、王之相、费孝通、徐悲鸿等党派、产业界、教授24位代表性人物。但中共中央考虑到各位民主人士的安全，建议暂时留在北平，并为后续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一些工作。

此时樊弘想到的是胡适校长。据他本人回忆，当时他希望胡适校长不要出走，并到胡适家苦劝其留下来，希望他能成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贡献，但最终胡适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还是离开了北大。

1949年1月，通过中国共产党、爱国民主人士的多方努力，终于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由于常年的战乱，已无粮食可吃，傅作义将军派人向樊弘教授送来面粉两袋，樊弘在日记上这样写道：“今收到傅作义将军送来面粉两袋。”1949年1月26日，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樊弘、袁翰青、薛愚、劳君展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义发表《拥护毛主席八项主张》同日，又以九三学社名义发表宣言。

1949年9月，樊弘受邀参加中共中央为民主人士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连声称赞他是“社会科学家”。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樊弘出席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担任经济小组的副组长，之后又多次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解经济理论。在如此众多的荣誉面前，樊弘想到的只是如何为建设新中国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我国实行极其严厉的“封锁、禁运”，很多国家中断了与我国的直接贸易关系，使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为打破“封锁、禁运”，扩大影响，恢复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1952年4月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南汉宸（1950年加入民建）和雷任民（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分别担任正副团长。樊弘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世界经济学会会议。会议上樊弘见到了自己多年未见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分外亲切。樊弘见到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后来，在樊弘的邀请下，罗宾逊夫人访问中国，由樊弘接待。樊弘代表新中国的经济学家，热情地宣传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雷任民、秘书长冀朝鼎也非常高兴，对他讲“你认识的经济学家很多，英文又好，可以为新中国做宣传工作”，于是樊弘更加努力地同外国学者交流。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使新中国的影响大大增强，中国同英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直接的民间贸易关系，中国与芬兰、锡兰（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则建立了政府间贸易关系。这个会议成果的巩固和扩大，为新中国在1954年内瓦会议上进一步拓展与西欧国家贸易往来，建立半官方贸易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精耕学术 为国育才

樊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均有精深的研究。他一生发表专著10余本，论文100余篇，涉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以及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而且，他的学术论文

谢觉哉倡导“学以致用”读书法

钱国宏

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处工作。一天，谢觉哉拟了一则会议通知，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竟然全部修改了。谢觉哉很纳闷：“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毛泽东回答了两个字：“你学！”

毛泽东的答复，让谢觉哉很受触动。同时，他对学习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读书，到底要怎样读？应该读哪些方面的书？经过思考，谢觉哉开始进行“补课”——搞清自己在哪些方面、领域存在不足和欠缺，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和学习。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读书要坚持学以致用、多读好书、持之以恒。首先，读书对工作要有所帮助，“积累知识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搞学问，搞好工作。”其次，读书要注重消化吸收，多读让自己受益的好书。最后，读书要持之以恒，点滴积累。

一次，一位年轻的同志因读书不得要领，专程向谢觉哉请教读书之法：“我平时读书没有什么计划，总是东抓一本看看，西抓一本看

看；觉得要读的东西很多，自己又处理不好，每天忙忙碌碌，琐碎碎碎，很有些杂乱无章，我一直为这事苦恼呢！”谢觉哉沉吟片刻，说：“你可以试试，晨思夜读，重新学习。”并随手拿起铅笔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晨思夜读，重新学习”几个字。接着他又解释说：“为什么要晨思呢？因为晨是一天的开始，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在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不要急于做，而在于计，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计就是思。孟子说过一句话：‘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之。思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人所思的内容和方法同孟子时代自然不同，但是多思这一点，则是自古以来有成就的人都是重视的。你可以结合工作的特点去思，你觉得自己常常是杂乱无章，那就思如何才能使杂乱无章变为杂乱有章，使工作效率高一些，一天抵两天用，思的目的在于多得。夜读，是根据你工作的特点提出来的，白天忙于工作，没有完整的时间读，就利用晚上，每天晚上抽它一两个小时攻读一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坚持下去，不就有个完整的时间了吗？时间对一个人来说是少的，也是多的，会挤时间，会利用时间的人，可以把少变成多，对他来说，时间就是多的。相反，给你再多时间，你不去利用，就是少的。思是必要的，但只靠思还不成。思而不学则殆，危险！学而不思则罔，同样也是无用的。思要读，读得多，读得多，思则广，思越广，读得多，读得多，晨思夜读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年轻人按照谢觉哉所说的读书方法读书，后来果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收获。

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谢觉哉担任政府委员、司法部部长。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司法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司法干部。他坚持写讲课提纲，并每天讲课3个小时。新中国成立前夕，接收北平后，将原朝阳大学改为中国政法大学，谢老兼任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校长，为全国培养大批司法干部。这期间，谢老又是把“补课”融入自己